



朱
万
曙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沈璟评传

沈璟评传

朱 万 曙 著

中国
戏剧
出版
社

沈 嘏 评 传

朱万曙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15千字 6.125印张 2插页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册

ISBN 7—104—00410—6/K·35

新登:(京)字第150号

定价:3.40元

引 言

沈璟，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又号词隐生，江苏吴江人，是明中叶戏曲理论家和戏曲作家。

提起明中叶的戏曲家，人们首先想到的无疑是汤显祖。他所创作的《牡丹亭》传奇高举以情反理、情必胜理的大旗，奏出了时代最强音符，因而它一问世，立即出现了“家传户诵，凡令《西厢》减价”^①的盛况。时至今天，它仍然为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所喜读，“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如怨如诉的唱词也依然回绕在戏曲舞台上，深深拨动着观众的心弦。汤显祖的名字和《牡丹亭》相连

^① 沈德符《顾曲杂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四206页。

在一起煜煜生辉、光照千秋。相形之下，知晓沈璟的人却是寥寥可数的了，大约只有戏曲史、文学史的研究者才略知一二吧。

那么，为什么还要花费力气来研究和介绍沈璟呢？也许有人会这样发问。不错，这本小册子没有介绍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却以沈璟为主要对象，确有浪费读者宝贵时间之嫌，但是，也并非毫无理由——

沈璟在今天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似乎在戏曲史、文学史上也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如果把镜头推回到明中叶的戏曲艺术领域，他的影响却极为广泛，在当时他所受到的推崇和赞誉在某种程度上还超过汤显祖。吕天成著《曲品》一书，在论及当代戏曲家的高下时，将沈璟与汤显祖同列为“上之上”，但又将沈璟列于汤显祖之右，并且解释说：“予之首沈而次汤者，挽时之念方殷，悦耳之教宁缓也”^①；王骥德在其《曲律》一书中也认为，沈璟于明传奇的“中兴之功，良不可没”^②；而同时的另一位戏曲家毛允燧则径推沈璟为“词坛盟主”^③。这里，“词坛”应解释为“曲坛”，因为词在明代既非文学正宗，沈璟于词也无甚成就，并且当时词、曲的概念并不象今天这样泾渭分明，而是常常拉扯、混淆在一起，

① 吕天成《曲品》卷上。

② 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

③ 毛允燧《〈曲律〉跋》。

故而“词坛盟主”当是“曲坛盟主”之谓也。从这些评价看来，沈璟在明中叶戏曲艺术领域内的影响确实是一般戏曲家所不能比拟的。为什么沈璟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为什么他备受同时代戏曲家们的拥戴推崇？吕天成所解释的“挽时之念方殷，悦耳之教宁缓”指的是什么？王骥德所称道沈璟的“中兴之功”的内容是哪些？人们常说：明传奇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二个高峰、第二个黄金时代，既然如此，它也就可以被视为戏曲史上一个与元杂剧一样同等重要的时期，而上述种种问题又正是这个重要时期内的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换言之，沈璟这个人物牵涉到了明中叶戏曲发展的历史面貌。历史学科的任务首先是客观认识历史本来面貌，戏曲史研究同样以此为原则。不研究和了解沈璟，也就难以客观全面地认识明代戏曲发展的进程，这一点，已经为解放后的戏曲史研究所证明。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汤、沈之争”和“吴江派”问题，可以说是解放后的明传奇研究中的热点，很多研究者都曾撰文讨论，发表见解，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无一致的结论，相反，许多事实在讨论中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其症结在哪里呢？就在于对沈璟自身没有一个客观细致的认识，因而讨论要么在概念的圈子中游戏，要么在某一两条史料上阐发和坚持不同见解。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为了客观认识明代戏曲的历史面貌，有必要研究和了解沈璟，此其一。

沈璟曾经担任过吏部员外郎、光禄寺丞等中央官职，然而品秩都不高，因而他不可能象明代前期的杨荣、杨

士奇、杨溥那样以台阁重臣的显赫政治势力左右文坛或曲坛，他必须依靠他的“曲绩”以赢得众多戏曲家的青睐。事实也是如此。他于三十八岁弃官归隐，从此潜心戏曲研究和创作达二十年之久，一直到病老终年而不辍功，尽管没有留下象《牡丹亭》那样千古不朽的杰作，但成就较之同时代其它戏曲家来说却十分可观：他编著了《南曲全谱》、《唱曲当知》、《论词六则》、《遵制正吴编》、《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多种戏曲理论著作，他还创作了《红蕖记》、《埋剑记》、《义侠记》、《博笑记》等十七部传奇作品，在明一代的任何戏曲家都不象沈璟这样富有著述和创作，如果单从数量上着眼，沈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堪称魁首。这些理论著作和传奇作品还有相当一部分流传下来，对它们进行一番剖析探微，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明中叶戏曲艺术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以为繁荣当代戏曲之借鉴，例如，他的戏曲理论合理的部分是否能对我们今天戏曲艺术有启发意义？他的现存剧本能否加以改编重新演出？研究历史，客观认识是第一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今天和明天服务是第二步，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步。然而，为了这一步，我们又必须认真研究历史，正如列宁所说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①这是我们研究和介绍沈璟的第二个原因。

基于上述二方面原因，我们认为对沈璟这位明中叶重要戏曲家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在进入具体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当前，不少同志已经开始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文学艺术研究领域，尽管运用得还不令人满意，但至少可以启发我们：对于同一问题，多角度地、既宏观又微观、联系而动态地观察，其结果比起机械、静止地看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试图把沈璟放在明代传奇艺术发展的进程中作主体的、动态的考察，而尽可能避免机械、静止的观照。由于笔者学识浅陋，在研究探讨中必定有肤浅舛误之处，恳切希望专家和读者辨误纠谬，这不仅对于学术探讨有利，对本人来说同样是一种可贵的鞭策。

① 列宁《共青团的任务》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神童·进士·戏曲家

——沈璟的生活道路·····	7
一、从神童到进士·····	1
二、京官十五年·····	4
三、壮岁辞官的原因·····	6
四、隐逸吴江 寄情词曲·····	12
五、“儒道互补”的思想·····	20
六、著述和创作一览·····	26

第二章 “中兴之功，良不可没”

——沈璟的戏曲理论·····	31
一、明中叶曲坛“案头之曲”的阴影·····	32
二、提倡“场上之曲”的理论内容·····	43
（一）格律论·····	44
（二）本色论·····	64
三、戏曲理论的特色和积极意义·····	70

第三章 “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

——沈璟的戏曲创作·····	77
一、创作概貌·····	78
二、题材的新开拓·····	87
三、“风世”主旨的认识价值·····	93
四、矛盾的“人欲”观·····	105
五、“场上之曲”的艺术特征·····	109
(一) 情节——曲折奇巧·····	110
(二) 结构——由长趋短·····	114
(三) 场面——丰富生动·····	117
(四) 语言——浅近通俗·····	121
(五) 喜剧风格·····	126

第四章 “词隐先生，为词坛盟主”

——沈璟和明清曲坛·····	133
一、“汤、沈之争”辨正·····	133
二、“吴江派”质疑·····	150
三、沈璟与“苏州派”·····	160
四、吴江沈氏戏曲之家·····	172

第一章

神童·进士·戏曲家

——沈璟的生活道路

一、从神童到进士

从苏州城内乘船，沿着运河向东南漂行二十里，便会看到一个景色秀丽、风景宜人的江南城镇，古老的大运河从它的身边缓缓流过，美丽的太湖也在它的不远处闪烁着鳞鳞波光，“平湖落雁”、“太湖春波”、“洞庭白云”、“垂虹夜月”、“华严晓钟”、“海云夕照”、“夹浦归帆”、“龙庙甘泉”，这八大景色曾吸引了众多的骚人墨客在此驻足，并且赋诗题咏^①。这个地方叫松陵镇^②，是苏州府吴江县治所在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十

① 参见清郭琇、屈运隆《吴江县志》卷二。

② 吴江县共有六大镇：盛湖、黎里、平望、庵村、黄溪、松陵。

四日，沈璟就降生在松陵镇。

也许是“造化钟神秀”的缘故吧，出生在这样一个江南水国之乡，沈璟从小就生得皮肤白皙，眉目如画，且身材瘦弱，小小年纪就带有了几分书生气。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颖悟聪明、天资过人。才几岁时，他就能对答出大人命拟的对联，并且声音响亮，绝无羞涩委琐之态，大人教他读书，他过目成诵。这样的天分确实令人诧异，因此，他被人们称为“神童”。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开始领他去拜见当时的名流，其中有刑部主事唐一庵，南赣巡抚陆北川，苏州知府蔡国梁等，他们都十分赏识沈璟，认为他天资不凡，将来肯定是大明王朝的栋梁^①。

确实，当这个神童来到世上并且逐渐长大的时候，谁也未曾料想到他日后留名青史的竟缘于他是一位戏曲家。《明史》上有其曾祖“沈汉传”，沈璟的名字只是一笔带过而已。当时的社会一个人的最佳选择就是读书，而后做官，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膝下的一个忠实臣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是被那个社会所目为最正确的人生道路。沈璟一来到这个世上，就不得不接受这一被社会所公认、为前辈所早已规定好了的“最佳选择”。

具体敦促沈璟走上这条道路的自然是他的父亲沈侃。沈侃本来所选择的也就是读书做官的道路，然而可悲的

^① 参见《吴江沈氏家谱》所附“家传”。《家谱》为清沈光照修撰，乾隆五十二年刻本，民国二十年北京图书馆传抄。

是，他在读书与做官这条道路的中间被卡壳了。做官当然要读书，但读书并不一定能做官，因为要做官还必须经过一个重要环节——科举考试。沈侃虽然读书，但是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在沈璟考取进士数年之后，他仍然带着次子沈瓚一同在科场奋斗，但结果是，次子也考取了进士，他自己却再次落第而归。正是由于经受了多次挫折，他对儿子的教育抓得很紧，“训督诸子严急，不遗余力”。^①据说，他对沈璟等三个儿子的要求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少弗弄，长不令见异物。过必谴，出入必与谐；所延致必明师良友，凡文之佳者无弗秘而习也”^②。万历二年，沈璟到京城参加会试，他送至镇江，写了一首题为《春日焦山与璟儿言别兼勗瓚儿》的七律：

江风习习水增波，江上轻云映薜萝。

花鸟留连堪唱和，关山游览易蹉跎。

春光渐觉闲中老，行色宜怜梦里多。

此去燕台须努力，莫叫汗血后鸣珂。^③

这是沈侃留下来的唯一的一首诗作，写得很是一般，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是，慨叹自己年岁渐老，春光易去，功名难就，寄希望之心于儿辈的心情却隐然可见。

①② 均见王世懋《王奉常集》卷一十六《沈瀛山传》。王世懋为王世贞之弟，沈璟亲家。

③ 诗见《吴江沈氏诗集录》。

在沈侃这种殷殷期望和“不遗余力”的督促下，沈璟读书十分勤勉，加之他天资聪颖，十六岁就补为邑弟子员，十八岁则被录为廪膳生员，二十一岁在应天乡试中考取第十七名举人，二十二岁参加会试，名列第三，继而在皇帝亲自主考的廷试中，得二甲第五名，赐进士出身。“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寒窗无人知”，沈璟由当年的小神童变为了最年青的进士，真可谓少年得志了。

二、京官十五年

万历二年（1574），沈璟作为新科进士，在兵部观政（犹今天所谓的“见习”）一段时间后，于当年被正式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从此，沈璟开始了十五年的京官生活。

身居庙堂的沈璟十分勤勉地为大明王朝效臣子之力。兵部职方司主要掌管军政、舆图、征伐、镇戍等事务，它需要对全国各地的军队情况十分了解。沈璟把一些将官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放在随身携带的口袋里以备查考，其熟悉程度令他手下的人惊诧不已。五年后，他调任礼部仪制司，并擢升员外郎之职。仪制司负责颁朝仪、辨宗封、定冠服，事务十分繁琐，是礼部最忙碌的一个司。但是沈璟以他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将一切事务都处理得有条不紊、细致周密，甚至连校勘记录宗藩名封的文件一类的小事他都亲自动手，而不率意让一般的办事员去处理。万历九年

(1581)，他又被调到吏部，先后担任稽勋司、考功司、验封司员外郎，他依然是那样地兢兢业业，时时留心察访，发现人才。

万历十四年，沈璟的仕途遇到了一点小挫折，其原因在于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未生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生下了朱常洛，郑贵妃则于万历十四年生下朱常洵。按照封建宗法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既然皇后无子，朱常洛应该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可是，明神宗宠爱郑贵妃，自然就有意立朱常洵为皇位继承人，因此，他有意拖延，迟迟不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皇帝的意图很明显，于是朝中不少臣子开始为“国本”问题担忧，他们怕明神宗废长立幼，一来坏了祖宗的规矩，二来会引起朝廷内乱。沈璟就是其中之一。他给明神宗上了一个疏本，要求赶快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进封王恭妃为贵妃。这一举动无疑使明神宗大为恼火，他下令将沈璟贬官三级，由员外郎降为行人司司正，并差他返回吴江县，实际上是体面地把他撵出了京城。

也许沈璟还算是一个尽忠于大明王朝的臣子的缘故吧，遭贬谪的第二年，他还是被再度起用，任命为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又被提升为光禄寺丞。但是，万历十七年（1589），也就是他升任光禄寺丞的第二年，他却称病辞官，并且从此再也没有返回朝廷，这一年他才三十七岁。

壮岁辞官，这在沈璟一生的生活中是件大事，是他的

仕宦生活的终点，又是他步向戏曲艺术领域的起点。他为什么要壮岁辞官呢？

三、壮岁辞官的原因

沈璟壮岁辞官的原因，按照目前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因为他在顺天乡试中录取了当时的首辅申时行的女婿李鸿，引起朝中一些人的议论，故而辞官。从《明实录》、《明通鉴》、康熙《吴江县志》，以及《吴江沈氏家谱》诸书籍的记载来看，这一看法大体符合实际。但是有的研究者进而认为，沈璟录取李鸿是不坚持原则，因而是“执政的追随者”^①。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首先，沈璟与申时行虽然有师生和同乡关系，但是这种师生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即沈璟参加殿试，申时行是评阅官，万历二年参加廷试者有二百九十九人，而评阅官有十三人，论起来他们都是师生关系，难道独独沈璟与申时行关系亲密一些吗？况且在我们迄今所掌握的沈璟与人交游的材料中，没有一条与申时行有关，仅有这样一种师生关系和同乡关系，并不足以使沈璟无原则录取李鸿。其次，《吴江沈氏家谱》所附“家传”说，沈璟“阅文具只眼，……戊子顺天之役，公所得士有长洲李鸿者，为申少师婿，谈者以为私，公不自白；及申少师归，而鸿以乙

^① 徐朔方《汤显祖和沈璟》，见《论汤显祖及其它》第119—120页。

未成进士，上饶之政，为世名臣，谈者始息”。这里，“家传”之意，乃是赞赏沈璟善于发现人才，李鸿的录取即其一例。如果“家传”不可尽信，成书更早的康熙二十三年《吴江县志》对此事也有记载：沈璟“为顺天乡试同考官，所得士有李鸿，为时行婿，言者以为私，璟不自白；及鸿成乙未进士，知上饶与税监忤，疑谤始息。”再次，李鸿中进士为万历乙未（1595）年，而申时行于万历辛卯（1591）年即已告归回家，前后相差五年，时行家居无权，朝中尚有对立面，加上李鸿录取举人时已经闹过一次风雨，如果李鸿真的毫无才学，而是由沈璟凭私情录取，那么此时谁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再行录取他为进士？因此，我们认为，沈璟录取李鸿并非“不坚持原则”，恰恰是出于公心为封建王朝发现人才，是“阅文具只眼”的结果。事实也是如此，李鸿在上饶痛责税监，其所做所为表明他不仅有才，而且德才兼备。

沈璟固然是因为李鸿事件而辞官，但辞官后他却为何再也不回朝廷呢？《吴江沈氏家谱》所附“家传”说他“虽无癸巳之察，固亦不出矣”，换言之，沈璟已经决意离开仕途了。仅仅是李鸿这件事，似乎不应当引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沈璟着意于仕途，则更不会有此结果。因此，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行探讨一下沈璟辞官的更深层原因。结合考察当时朝廷的政治背景，沈璟之所以壮岁辞官，是为了逃避当时朝廷复杂的政治斗争，李鸿的事件只不过是触机而已。